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 世界 投资报告 2015

## 概述

国际投资治理的改革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 世界 投资报告 2015

国际投资治理的改革

要旨和概述



联合国

纽约和日内瓦，2015

## 说 明

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是联合国系统内处理与投资和企业发展相关议题的全球高级研究中心。它以40年在研究和政策分析方面的经验和国际专门知识为基础，促进建立政府间共识，并向150多个国家提供技术援助。

本报告所用“国家/经济体”一词酌情亦指领土和地区。本报告所用的名称以及材料的编排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主管当局的法律地位、或者对其边界或疆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此外，国家类别名称的使用完全是为了便于统计或分析，未必表示对某一国家或地区在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发展阶段作出判断。本报告所用主要国家类别沿用联合国统计厅的分类：

- 发达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国(智利、墨西哥、大韩民国和土耳其除外)，加上不属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欧洲联盟新成员国(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拉脱维亚、立陶宛、马耳他和罗马尼亚)，外加安道尔、百慕大、列支敦士登、摩纳哥和圣马力诺。
- 转型期经济体：东南欧国家、独立国家联合体和格鲁吉亚。
- 发展中经济体：泛指所有不在以上之列的经济体。出于统计的目的，中国的数据不包括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中国台湾省的数据。

贸发会议述及某一公司或其活动，不应被视为认可该公司或其活动。

在本出版物提供的地图上显示的边界和名称以及使用的称呼，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对其正式认可或接受。

图表中使用了下列符号：

- 两点 (..) 表示没有数据或无法得到单独的数据。表格中如果某行的任何一项均无数据，则予删除；
- 破折号 (—) 表示该项数据等于零或可略去不计；
-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表格中的空白表示该项目不适用；
- 代表年份的数字之间的斜线 (/)，如2010/11, 表示财政年度；
- 在代表年份的数字之间使用连接符 (–) 如2010–2011, 表示财政年度；
-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元” (\$)指美元；
- 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年增长率或变动率均指年复合率；
- 表内各分项数字或百分数由于四舍五入的缘故，其合计数未必与总计数相等。

本报告所载资料尽可引用，但需恰当注明出处。



## 前 言

今年的《世界投资报告》是该系列报告的第25期，它的目的是通报关于跨境投资国际政策环境的未来方面的全球辩论情况。

继最近的全球经济增长低迷之后，今年的报告显示，2014年的外国直接投资内流下降16%，为1.2万亿美元。但是，2015年及2015年以后的复苏已可见端倪。今天，在对发展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部发展融资中，外国直接投资流动占40%以上。

亚的斯亚贝巴的第三次发展融资问题国际会议以及许多重大讨论都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国际投资政策制定和财政制度对执行新的发展议程和在未来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进展的重要性，因此本报告尤为及时。

《世界投资报告》处理国际投资保护和促进方面的关键挑战，包括监管权、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和投资者的责任等。它还研究了国际投资的财政待遇问题，包括多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贡献、通过避税的财政流失和离岸投资联系的作用等。

本报告改革国际投资条约制度的各种备选办法的菜单以及指导国家、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的决策者的一份路线图。它还提出了一套原则和准则，以确保国际税务和投资政策之间的一致。

我赞扬这一出版物，在今年这一对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年份，它是国际投资界的重要工具。



联合国秘书长  
潘基文

## 鸣 谢

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由James X. Zhan(詹晓宁)领导的小组编写。小组成员有：Richard Bolwijn、Kwangouck Byun、Bruno Casella、Joseph Clements、Hamed El Kady、Kumi Endo、Masataka Fujita、Noelia Garcia Nebra、Axèle Giroud、Joachim Karl、Ventislav Kotetzov、Guoyong Liang(梁国勇)、Hafiz Mirza、Shin Ohinata、Sergey Ripinsky、Diana Rosert、William Speller、Astrit Sulstarova、Claudia Trentini、Elisabeth Tuerk、Joerg Weber和Kee Hwee Wee。

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受益于高级税务总顾问Jeffrey Owens的咨询意见。

Bradley Boicourt、Mohamed Chiraz Baly 和 Lizanne Martinez提供了研究和统计资料支持。Bekele Amare、Ana Conover Blancas、Hasinah Essop、Charalampos Giannakopoulos、Thomas van Giffen、Natalia Guerra、Rhea Hoffmann、Mathabo Le Roux、Kendra Magraw、Abraham Negash、Chloe Reis、Davide Rigo、Julia Salasky、John Sasuya、Carmen Saugar Koster、Catharine Titi以及实习生Anna Mouw和Elizabeth Zorrilla也对报告作出了贡献。

Lise Lingo协助编辑了手稿，Laurence Duchemin和Teresita Ventura进行了排版。

Sophie Combette和Nadège Hadjemlan 设计了封面，Pablo Cortizo设计了图表和地图。

Elisabeth Anodeau-Mareschal、Anne Bouchet、Nathalie Eulaerts、Rosalina Goyena、Tadelle Taye和Katia Vieu为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的印制和分发提供了支持。

在编写报告的不同阶段，特别是为讨论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草稿而举行的专家会议期间，编写小组得益于以下外部专家的意见和建议：Wolfgang Alschner、Carlo Altomonte、Douglas van den Bergh、Nathalie Bernasconi、Yvonne Bol、David Bradbury、Irene Burgers、Jansen Calamita、Krit Carlier、Manjiao Chi、Steve Clark、Alex Cobham、Aaron Cosby、Lorrain Eden、Maikel Evers、Uche Ewelukwa、Michael Ewing-Chow、Alessio Farcomeni、Michael Hanni、Martin Hearson、Steffen Hindelang、Lise Johnson、Michael Keen、Eric Kemmeren、Jan Kleinheisterkamp、Victor van Kommer、Markus Krajewski、Federico Lavopa、Michael Lennard、Jan Loeprick、Ricardo Martner、Makane Mbengue、Nara Monkam、Hans Mooij、Ruud de Mooij、Peter Muchlinski、Alexandre Munoz、Thomas Neubig、Andrew Packman、Joost Pauwelyn、Facundo Perez Aznar、Raffaella Piccarreta、Andrea Saldarriaga、Mavluda Sattorova、Ilan Strauss、Lauge Skovgaard Poulsen、Christian Tietje、Jan van den Tooren、Gerben Weistra和Paul Wessendorp。MEED为获得西亚区域的数据提供了协助。

还要感谢贸发会议其他各司，包括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和特别方案司、全球化与发展战略司以及技术和物流司，作为内部同行审查进程的一部分提出了评论，秘书长办公室也作为审查和审批程序的一部分提出了评论。联合国制图科在区域地图方面提供了咨询意见。

中央银行、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许多工作人员也为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做出了贡献。在此也衷心感谢芬兰、挪威、瑞典和瑞士政府提供的资助。

# 目 录

前言 .....	V
鸣谢 .....	VI
要旨 .....	IX
概述 .....	1
全球投资趋势 .....	1
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趋势 .....	15
投资政策趋势 .....	22
改革国际投资制度：一份行动菜单 .....	27
国际税务和投资政策的一致性 .....	33



## 要 旨

### 全球投资趋势

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有所下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在2014年下降了16%，即下降到1.23万亿美元，原因主要是全球经济脆弱，对投资者的政策不确定以及地域政治风险高。新的投资也由于一些大的撤资而被抵消。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历史新高，为6,810亿美元，增长2%。因此，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方面保持了领先地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在世界上前10名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中，有5个是发展中经济体。

2014年，对发达国家的流量依然很低。尽管跨境并购有所回升，但对这一组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总流量下降了28%，即下降到4,990亿美元。这些经济体的流量由于美国的一次大规模撤资而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多国企业的投资也达到了历史新高：发展中亚洲目前对国外的投资高于任何其他区域。在20个最大的投资国中，有9个是发展中或转型期经济体。这些多国企业在继续收购在发展中世界的发达国家外国子公司。

2014年，大多数区域集团和倡议的流入量有所下降。参加“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的国家集团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中的总比额有所下降。东盟和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的趋势正相反，分别增加到1,330亿美元(上升5%)和3,630亿美元(上升4%)。

从部门的情况来看，近10年来，外国直接投资继续向服务业转移，这是由于该部门的自由化日益加剧，服务贸易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服务业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全球价值在增大。2012年，服务业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63%，是制造业比额(26%)的两倍以上。第一产业占总额的10%以下。

2014年，跨境并购强劲反弹，达3,990亿美元。价值大于10亿美元的多国企业交易量从2013年的168个增加到223个，创2008年以来的新高。同时，多国企业的撤资额相当于收购额的一半。

公布的绿地投资下降到6,960亿美元，即下降2%。发展中国家仍然吸引着三分之二公布的绿地投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国企业的绿地投资都保持不变。

专门投资者所作的外国直接投资各有差别。2014年，私募股权基金在全球并购市场上的收购额为2,000亿，其重要性主要反映在涉及到大公司的交易中。主权财富基金2014年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60亿，在国际上越来越面向基础设施。特别是，国营多国企业的国际扩张有放缓；它们的跨境并购减少到690亿美元，即减少39%。

多国企业的国际生产在扩张。2014年，国际产量增加，创造了约7.9万亿美元的附加值。多国企业外国子公司的销售额和资产增长速度快于它们国内的同行。多国企业的外国子公司雇用约7,500万人。

外国直接投资的复苏已在眼前。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预计将增加到1.4万亿美元，即增加11%。2016年预期将进一步增加到1.5万亿美元，2017年增加到1.7万亿美元。贸发会议的外国直接投资预报模型及其大型多国企业经营调查都显示今后几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增加。多国企业打算在今后三年(2015年至2017年)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支出的，其占比从24%增加到了32%。2015年，跨境并购的趋势也表明增长的回归。但是，有一些政治经济

风险，包括欧元区目前的不确定性、地域政治紧张局势可能产生的外溢效应，新兴经济体的持续脆弱等，都可能使预测的复苏难以为继。

## 区域投资趋势

流向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稳定在540亿美元。2012年，虽然服务业在非洲外国直接投资中的占比仍然低于全球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值，但是服务业在该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总存量中的比额则达到48%，是制造业所占比额(21%)的两倍多。第一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占总额的31%。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集中在少数国家，包括南非、尼日利亚和摩洛哥。

发展中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创历史新高，增长9%。2014年，它们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达到近5,000亿美元，这进一步加强了该区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者的地位。流入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到了3,810亿美元，即增加10%。最近几年，多国企业通过对基础设施的跨境投资，成了在该次区域加强区域连通的一支主要力量。西亚的安全局势造成连续6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2014年减少到430亿美元，即下降4%)；该区域部分地区私人投资走弱，但公共投资的增加填补了这一空白。在南亚，制造业，包括汽车产业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到了410亿美元，即增加16%。

2014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在连续4年增加以后，减少到1,590亿美元，即下降14%。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美洲和加勒比跨境并购的减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这使流向南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减少。经过一段时期受大宗商品价格高昂推动的外国直接投资强劲流入以后，外国直接投资的放缓对拉丁美洲国家来说可能是一次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重新评估外国直接投资战略的机会。

2014年，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到480亿美元，即减少52%。区域冲突，加上石油价格下降和国际制裁，损害了该区域的经济增长前景，使投资者的利益缩水。

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到4,990亿美元，下降28%。公司内部贷款的撤资和大幅度波动，使流入量下降到了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稳定在8,230亿美元。跨境并购活动的势头在2014年有所增强。外国直接投资收入迅速增加，提供了一种对贸易赤字的抗衡机制，特别是在美国和日本。

结构薄弱、脆弱和小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各有差别。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加了4%。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3%，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流入量减少。相反，流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由于跨境并购销售的增加而上涨了22%。与其他金融手段的来源相比，外国直接投资更加重要，更加稳定，对发展的影响更加多样，因此它仍然是这些经济体外部发展融资的一个重要部分。在2014年前的10年，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翻了三番，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翻了四番。如果国际投资—发展界齐心协力，结构薄弱的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就能够在2030年前再次翻四番。更重要的是，必须作出进一步的努力，利用金融来实现经济多样化，增强这些国家的抵抗力和可持续能力。

## 投资政策趋势

国家投资政策措施仍然着重于投资的自由化、促进和便利化。2014年，投资政策措施的80%以上以改善准入条件和减少限制为目标。其中一个重点是投资便利化和具体部门的自由化(如基

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新的投资限制主要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和战略行业(如运输、能源和国防)。

关于针对可持续发展重要的部门的投资，其措施仍然较少。2010年至2014年，只有8%的措施是专门为了私营部门参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部门(基础结构、卫生、教育、气候变化减缓)而采取的。鉴于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投资存在差距(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应该更加着重于将投资输入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部门。

国家和区域继续探讨对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改革。2014年新缔结了31项国际投资协定，大多数都载有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规定。加拿大是最活跃的国家(新缔结了7项协定)。国际投资协定的范围增加到了3,271项条约。同时，各国和各区域审议了对投资决策采取的新方法。当前全球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运行情况越来越令人不安，再加上当今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和投资格局的演变，因此，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至少有50个国家和地区对自己的国际投资协定模式在进行审查和修订。巴西、印度、挪威和欧洲联盟公布了新颖的办法。南非和印度尼西亚在继续终止条约的同时，还在拟订新的国际投资协定战略。

纳入设立前承诺的国际投资协定数量较少，但在不断增加。目前约有228项条约规定对投资的“收购”或“设立”实行国民待遇。这种条约大多在美国、加拿大、芬兰、日本和欧盟，但有少数发展中国家(智利、哥斯达黎加、大韩民国、秘鲁和新加坡)也在走这条道路。

2014年新增42起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使已知基于条约的诉讼总数达到608起。发展中国家在这些诉讼中一直首当其冲，但发达国家所占的比额在增加。大多数索赔人来自发达国家。2014年发布了43项裁决，使结案总数达到405起，其中国家胜诉的占36%，投资者胜诉的占27%。其余有的得到解决，有的中止。

## 改革国际投资制度： 一份行动菜单

全球国际投资协定制度迫切需要系统改革。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热烈的公共辩论和议会听审过程中显而易见，在改革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必要性方面正在形成共识，以确保该制度适用于所有利益相关方。问题不是是否要改革，而是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以及改革的范围。本报告为这种改革提供了一份行动菜单。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可以建立在从过去60年国际投资协定的规则制定中获得的教益之上：（一）国际投资协定“有刺”，可能会有预料不到的风险，因此必须制定保障措施；（二）国际投资协定作为投资促进的工具具有其局限性，但也有潜力没有充分利用；（三）国际投资协定对政策和系统的一致性以及能力建设的影响更广。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应解决五大挑战。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目的是：（一）为公共利益保障监管权，以确保国际投资协定对国家主权的限制不过分制约公共决策；（二）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现行制度的合法性危机；（三）有效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方面，以促进和便利于投资；（四）确保负责任的投资能使外国投资的正面影响最大化，使外国投资的潜在负面效应最小化；（五）加强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系统一致性，以克服现行制度的差距、重叠和不一致，并在投资关系中确立一致性。

贸发会议为应对这些挑战提出各种政策选择。本报告阐述处理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发现的典型内容的各种选择。其中有些改革选择可予以合并，专门用于达到若干改革目标：

- **保障监管权：**备选办法有，澄清或界定诸如最惠国待遇、公正和公平待遇、间接征收等等的规定，还包括诸如公共政策或国家安全等等的例外。
- **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备选办法包括，(一) 改革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现有的特设仲裁机制，同时保持其基本结构；(二) 取代现有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仲裁制度。要实现备选办法一，可以修正现有机制(如改善仲裁进程，限制投资者的准入，采用过滤措施，实行当地诉讼要求等)以及增加新的内容(如内设有效的替代争端解决办法或采取一种便于上诉的机制)。如果国家想代替现行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制度，它们可以建立一个常设国际投资法院，或者依靠国家与国家(和)国内争端解决办法。
- **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备选办法包括增加对内和对外投资促进的规定(即东道国和母国措施)以及联合和区域投资促进的规定，包括负责投资便利化问题的一名监察专员。
- **确保负责任的投资：**备选办法包括增加一些不降低标准的条款并制定关于投资者责任的规定，如遵守国内法和公司社会责任等的条款。
- **加强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系统一致性：**备选办法包括，改进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一致性，合并和简化国际投资协定网络，管理国际投资协定与其他国际法机构之间的互动，将国际投资协定改革与国内政策议程联系起来。

在实行国际投资协定改革时，决策者必须确定保障监管权的最有效手段，同时提供投资保护和便利化。在这样做时，它们需要考虑各种备选办法的综合效应。有些改革办法的组合可能会“过犹不及”，可能会造成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传统的投资保护理念。

关于改革过程，国际投资协定的改革行动应该在国家、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予以协同。在每一种情况下，改革进程包括：(一) 衡量并查明问题，(二) 拟订改革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计划，(三) 开展行动并取得成果。

所有这些都应遵循利用国际投资协定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发展的目标，并围绕关键的改革领域，采取多边、系统和包容性的方针。由于没有一个多边系统，而且现有国际投资协定的数量巨大，因此，要使国际投资协定制度促进可持续发展，最好的办法是用全球性的支持结构，对该制度进行集体改革。这种结构能通过政策分析、各进程在各层次和方面的协调、与其他法律体系的互动管理、技术援助和共识等，为国际投资协定改革提供必要的支持。贸发会议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只有采取共同的方针，才能产生出这样一个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即：它的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见性能帮助实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目标：有效利用国际投资关系来追求可持续发展。

## 国际税务和投资政策的一致性

国际社会正在对多国企业的财政贡献问题开展热烈的讨论和具体的政策工作。重点主要放在避税问题上，尤其是在二十国集团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项目中。同时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需要

持续投资，特别是鉴于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资金。政策方面的当务之急，是要采取行动，制止避税，以支持国内资源的筹集，并继续便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性投资。

贸发会议估计，多国企业外国子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政府预算的贡献每年大约有7,300亿美元，平均占公司总贡献的23%，占政府总收入的10%。这项贡献的相对规模(和组成)因国家和区域的不同而有差别。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要高，突出说明发展中国家对公司贡献的开放性和依赖性。(非洲国家政府在预算筹资中平均有14%要依靠外国公司的付款。)

此外，一个国家在发展阶梯上越低，则对公司提供的非税收资金流的依赖性更大。在发展中国家，外国子公司通过自然资源使用税、关税、工资税和社会捐款以及其他各种杂项税收，向政府收入作出的贡献要比通过公司收入税作出的贡献大一倍以上。

多国企业通过跨境投资建立公司结构。在这过程中，它们采取省税的方式，并以自己的商业和业务需求为限。因此，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往往受到多国企业税务考虑的影响，因为投资的结构和方式有助于在随后的投资收入方面创造避税的机会。

从投资角度看避税问题，便能凸显离岸投资中心(其他国家的避税天堂和特殊目的实体)作为全球投资参与方的作用。跨境公司投资存量约有30%在作为生产资产到达各自的目的地之前都途经离岸中心。(贸发会议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库消除了有关的双重计算效应。)

离岸中心在全球公司投资中的作用巨大，原因主要是税务策划，虽然其他因素也可能起到一种助长的作用。多国企业利用一系列的避税杠杆，借助于辖区之间的税率差、立法不配套和税务条约。多国企业的税务策划涉及到复杂而多层次的公司结构。明显的有两大类：(一) 基于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计划；(二) 融资计划。这两种计划都代表了避税做法的一个相关部分，它们利用与离岸投资中心的实体有关的投资结构——融资计划特别依靠通过投资中心的直接投资联系。

多国企业的避税做法是一个全球问题，与所有国家都有关系：在面临来自离岸中心的投资方面，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大致相同。但是，如果利润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出，就可能会对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前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的限制或者缺乏技术专门知识，因此在处理非常复杂的避税做法方面常常能力不足。

避税做法是发展融资资源大量流失之祸首。发展中国家估计每年损失1,000亿美元的税收，原因是与离岸中心直接有关的对内投资存量。离岸中心投资在东道国的内向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的比额与申报的(应交税的)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有着明显的关系，投资越是途经离岸中心，应征税的利润就越少。平均来说，在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离岸投资每增加十个百分点，回报率就减少一个百分点。这种平均值掩盖了在具体国家的影响。

多国企业的避税做法造成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的大量损失。这种情况对辖区之间税收分配所含的基本公正问题必须要解决。处于特别不利地位的，是那些征税能力有限，对公司投资者的税收依赖较大，对离岸投资的开放度日增的国家。

因此，必须采取行动，处理避税问题，同时要认真考虑对国际投资的影响。当前，离岸投资中心在国际投资流动中发挥了系统性作用：它们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金融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在国际层面采取任何措施，如可能影响到这些中心的投资便利化职能的，或者采取关键的投资便利化手段(如税务条约等等)，都必须有一个投资政策的视角。

当前国际社会对避税问题的讨论很少注意到投资政策，投资在建立有助于避税的公司结构中发挥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投资政策应该是所有解决投资避税问题的办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制订一套关于协调的国际税收和投资政策的准则，可能会有助于在投资政策与反避税倡议之间实现协同。关键的目标有：消除将激进的税务策划作为投资促进杠杆的机会；考虑反避税措施对投资的潜在影响；在承认东道国、母国和中转国之间的共同责任方面采取一种伙伴关系的办法；管理国际投资与税务协议之间的相互关系；加强投资和财政收入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提高发展中国家处理避税问题的能力。

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表明，全世界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在填补投资缺口，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缺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改善全球投资政策环境，包括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和国际税务制度，都必须是一个优先事项。这两个制度都像“意大利面碗”，都是由3,000多个双边协定组成的，相互关系密切，都面临同样的挑战。对这两个制度都在做努力的改革。即使两个制度各有自己的具体的改革重点，但也应该考虑一个共同的议程。这种议程的目标可以是在管理国际

税务和投资政策之间相互作用方面提高包容性，改善治理，加强协调，同时不仅要避免两个制度之间的冲突，而且还要使它们相互支持。国际投资和发展界应该而且能够最终为所有人的利益建立一个全球投资合作的共同框架。

## 概 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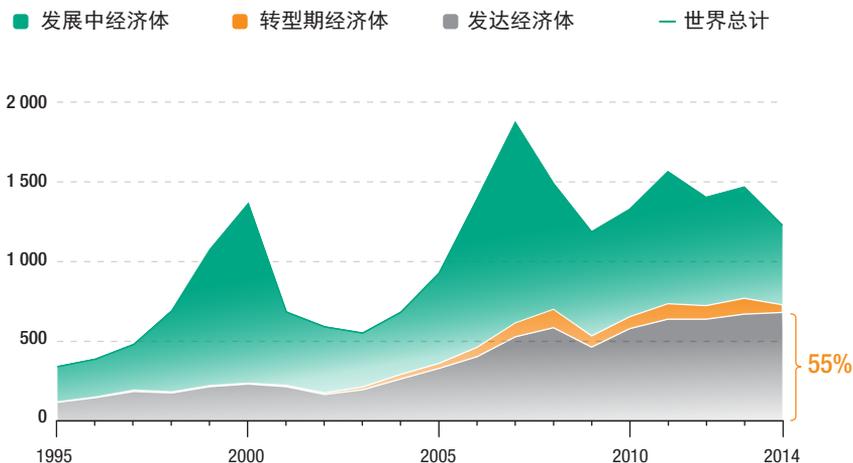
### 全球投资趋势

#### 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但复苏已初见端倪

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从2013年的1.47万亿美元减少至1.23万亿美元，下降16%(图1)。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全球经济脆弱，对投资者的政策不确定，地缘政治风险提高等。新的投资也被一些大的撤资所抵消。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下降与国内总产值、贸易、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就业等的宏观经济变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些变量都在增长(表1)。

图 1.

全球和按经济体组别分类的外国直接投资内流，  
1995年和2014年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表 1.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贸易、就业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2008-2016年（百分比）

变量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sup>a</sup>	2016 <sup>a</sup>
国内总产值	1.5	-2.0	4.1	2.9	2.4	2.5	2.6	2.8	3.1
贸易	3.0	-10.6	12.6	6.8	2.8	3.5	3.4	3.7	4.7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3.0	-3.5	5.7	5.5	3.9	3.2	2.9	3.0	4.7
就业	1.2	1.1	1.2	1.4	1.4	1.4	1.3	1.3	1.2
外国直接投资	-20.4	-20.4	11.9	17.7	-10.3	4.6	-16.3	11.4	8.4
<b>备忘录</b>									
外国直接投资额 (万亿美元)	1.49	1.19	1.33	1.56	1.40	1.47	1.23	1.37	1.48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关于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2008-2014年外国直接的投资数据库；联合国(2015年)关于国内总产值的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关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贸易的数据库；劳工组织关于就业的数据库；贸发会议关于2015-2106年外国直接投资的估计。

<sup>a</sup> 预测。

说明：外国直接投资中不包括加勒比离岸金融中心。

虽然外国直接投资的前景依然不确定，但2015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预期将有所回升。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在加强，油价降低对需求产生刺激效应，货币政策有所宽松，投资自由化和促进措施在继续，这一切都能够对外国直接投资流动产生有利的影响。贸发会议的外国直接投资预报模型及其大型多国企业业务调查都表明，在2015年和2015年后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将增加。

201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内流预期将增加到1.4万亿美元，上升11%。2016年和2017年的流量可能将分别进一步增加到1.5万亿美元和1.7万亿美元。据贸发会议的业务调查，多国企业打算在2015年至2017年增加外国直接投资支出的，其比例将从24%增加到32%。2015年头几个月的数据正好应验了这一预报。但是，有一些经济和政治风险，包括目前欧元区的不确定因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可能引起的外溢效应、新兴经济体的持续脆弱等等，都可能扰乱预测的复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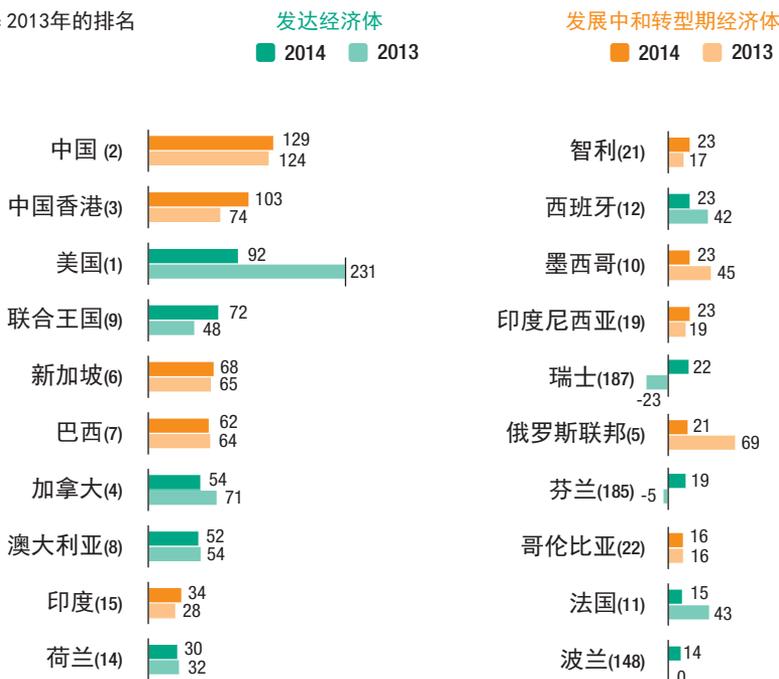
## 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内流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

发展中经济体的内流量达6,810万亿美元(表2)。这一组别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内流量的55%。外国直接投资10大东道主中现在有5个是发展中经济体(图2)。

图 2.

###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20大东道经济体， 2013-2014年(10亿美元)

(x) = 2013年的排名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说明: 不包括加勒比离岸金融中心。

表 2.

按区域分列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2012-2014 年  
(10亿美元，百分比)

区域	外国直接投资内流			外国直接投资外流		
	2012	2013	2014	2012	2013	2014
<b>全世界</b>	<b>1 403</b>	<b>1 467</b>	<b>1 228</b>	<b>1 284</b>	<b>1 306</b>	<b>1 354</b>
发达经济体	679	697	499	873	834	823
欧洲	401	326	289	376	317	316
北美洲	209	301	146	365	379	390
发展中经济体	639	671	681	357	381	468
非洲	56	54	54	12	16	13
亚洲	401	428	465	299	335	432
东亚和东南亚	321	348	381	266	292	383
南亚	32	36	41	10	2	11
西亚	48	45	43	23	41	3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78	186	159	44	28	23
大西洋	4	3	3	2	1	0
转型期经济体	85	100	48	54	91	63
<b>结构薄弱、脆弱和小型经济体<sup>a</sup></b>	<b>58</b>	<b>51</b>	<b>52</b>	<b>10</b>	<b>13</b>	<b>10</b>
最不发达国家	24	22	23	5	7	3
内陆发展中国家	34	30	29	2	4	6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7	6	7	2	1	1
<b>备忘录：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百分比</b>						
发达经济体	48.4	47.5	40.6	68.0	63.8	60.8
欧洲	28.6	22.2	23.5	29.3	24.3	23.3
北美洲	14.9	20.5	11.9	28.5	29.0	28.8
发展中经济体	45.6	45.7	55.5	27.8	29.2	34.6
非洲	4.0	3.7	4.4	1.0	1.2	1.0
亚洲	28.6	29.2	37.9	23.3	25.7	31.9
东亚和东南亚	22.9	23.7	31.0	20.7	22.4	28.3
南亚	2.3	2.4	3.4	0.8	0.2	0.8
西亚	3.4	3.0	3.5	1.8	3.1	2.8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12.7	12.7	13.0	3.4	2.2	1.7
大西洋	0.3	0.2	0.2	0.1	0.1	0.0
转型期经济体	6.1	6.8	3.9	4.2	7.0	4.7
<b>结构薄弱、脆弱和小型经济体<sup>a</sup></b>	<b>4.1</b>	<b>3.5</b>	<b>4.3</b>	<b>0.7</b>	<b>1.0</b>	<b>0.8</b>
最不发达国家	1.7	1.5	1.9	0.4	0.6	0.2
内陆发展中国家	2.5	2.0	2.4	0.2	0.3	0.4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0.5	0.4	0.6	0.2	0.1	0.1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sup>a</sup> 同时属于多个组别的国家没有予以双重计算。

但是，发展中国家内流量的增加主要是发展中亚洲的增加。流入该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到近4,650亿美元，上升9%，占发展中经济体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所有次区域都有明显的增加，但西亚除外，它的内流量连续第六年减少，部分原因是该区域的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不变，仍然是540亿美元，因为流入北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增加而被抵消。流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投资经过连续四年增加后减少到1,590亿美元，下降14%。

俄罗斯联邦作为接受国从第5名下降到第16名，主要原因是流入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到480亿美元，下降52%。

尽管跨境并购有所复苏，但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到4,990亿美元，下降28%。流入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到920亿美元，这是因为受到一次大规模斥资的严重影响，否则，投资额会保持稳定。对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到2,890亿美元，下降11%，从2007年的高峰下降了三分之一。

### 2014年，大多数区域集团和倡议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有所下降

2014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下降也影响到对区域经济集团的外国直接投资。例如，在谈判“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以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国家集团，它们各自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的比额都有所下降(图3)。两个亚洲集团，即东盟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却逆势而行，前者增加到1,330亿美元，即上涨5%，后者增加到3,630亿美元，即上涨4%。如果采取较长期的努力，各区域集团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多会增加，因为它会使各部门对投资实行开放，并统一关于投资者待遇的各种政策。

图 3.

### 若干区域和区域间集团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2013 年和2014年 (10亿美元，百分比)

区域/ 区域间集团	2013年		2014年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10亿美元)	占世界总计的 份额 (%)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10亿美元)	占世界总计的 份额 (%)
APEC	837	57	652	53
G20	894	61	635	52
RCEP	349	24	363	30
TTIP	564	38	350	28
TPP	517	35	345	28
BRICS	294	20	252	21
NAFTA	346	24	169	14
ASEAN	126	9	133	11
MERCOSUR	83	6	73	6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说明: 按2014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递降次序排名。G20 = 在这里指除欧洲联盟外的20国集团的19个成员国; APEC =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TTIP =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 TPP =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RCEP =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BRICS = 巴西、俄罗斯联邦、印度、中国和南非; NAFTA =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ASEAN = 东南亚国家联盟; MERCOSUR = 南方共同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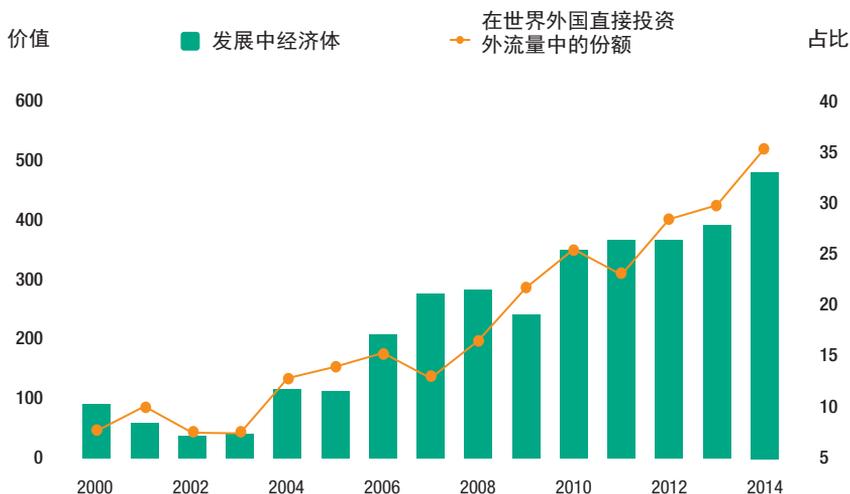
### 发展中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以亚洲多国企业为首，超过世界总计的三分之一

2014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多国企业在国外投资近4,68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23%。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中所占比例从2007年的13%增加到三分之一以上(图4)。发展和转型期经济体在全球20个最大投资经济体中占了9个(图5)。

发展中经济体流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三分之二，即从2009年的1.7万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2.9万亿美元。

图 4.

### 发展中经济体：外国直接投资外流量及其在世界外流总量中的份额，2000-2014年 (10亿美元，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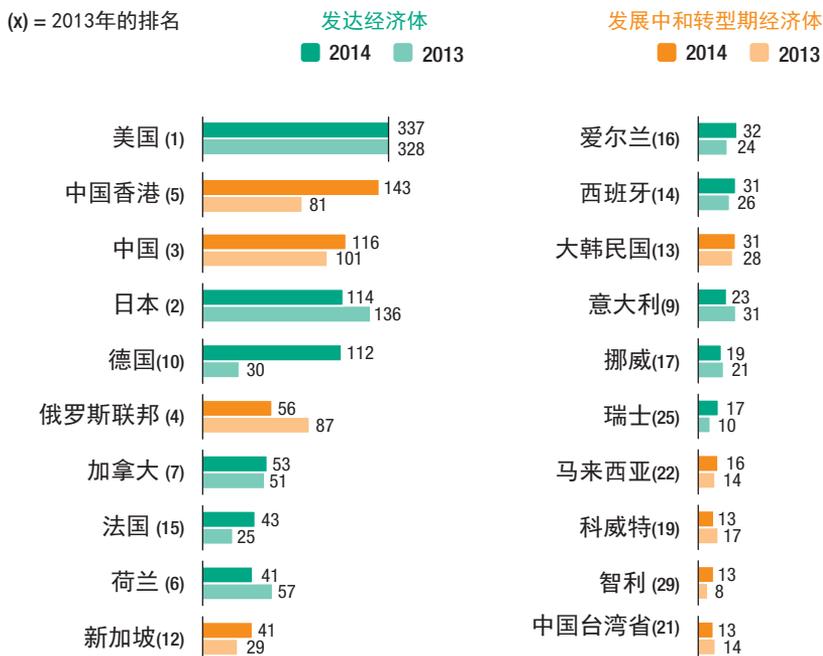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说明：不包括加勒比离岸金融中心。

东亚和东南亚是最大的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中区域。最穷的发展中区域在南南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比额依然很低，但在增加。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有许多流向各经济体的直接地理区域。对周边情况的熟悉，放缓了公司早日国际化的动力，区域市场和价值链则成为关键的推动力。决定南南外国直接投资具体格局的还有：多国企业的投资动机、母国政府的政策和历史联系。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外流在组成方面各有不同：一半以上的发展中国家多国企业的外流是股权投资，而发达国家的外流则包含较大的再投资收益股份(现在达81%)(图6)。股权的投资外流更有可能产生新的生产性投资；再投资收益也可能会转变为现金持有量的增加。

图 5.

### 外国直接投资外流：20大母国经济体， 2013和2014年(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说明：不包括加勒比离岸金融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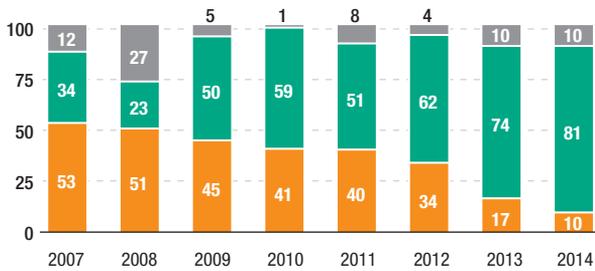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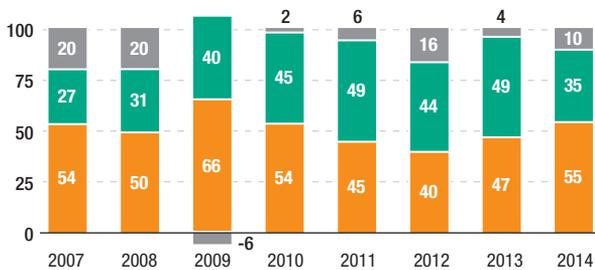
### 2014年，跨境并购活动强劲反弹；宣布的绿地项目略有减少

经过两年连续下降后，跨境并购活动于2014年出现反弹。以净价值计，跨境并购的价值增加了28%，达3,990亿美元，其原因是举债成本低，再加上多国公司拥有大量的现金储备。驱动这种交易的重要因素是：在找到新的增长点方面的竞争压力以及通过协同

图 6.

## 按经济体和组成成份列的外国直接投资外流量，2007-2014年（百分比）

■ 股权外流      ■ 再投资收益      ■ 其他资本(公司内部借贷)

发达国家<sup>a</sup> 多国企业发展中经济体<sup>b</sup> 多国企业

资料来源: 贸发会议, 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sup>a</sup> 包括的经济体有: 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联合王国和美国。

<sup>b</sup> 包括的经济体有: 阿尔及利亚、安圭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鲁巴、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伯利兹、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博茨瓦纳、巴西、柬埔寨、佛得角、智利、哥斯达黎加、库拉索、多米尼克、萨尔瓦多、斐济、格林纳达、危地马拉、洪都拉斯、香港(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大韩民国、科威特、莱索托、马拉维、墨西哥、蒙古、蒙特塞拉特、摩洛哥、纳米比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拿马、菲律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新加坡、圣马丁岛、南非、斯里兰卡、巴勒斯坦国、苏里南、斯威士兰、中国台湾省、泰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乌干达、乌拉圭、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和越南。

和规模经济来削减成本的必要性。大型交易的重新出现是跨境交易活动价值增加的一个关键要素。2014年，多国企业收购价值大于10亿美元的数量飙升至223个，而2013年只有168个。同时，多国企业也有过几次大的撤资，相当于收购总价值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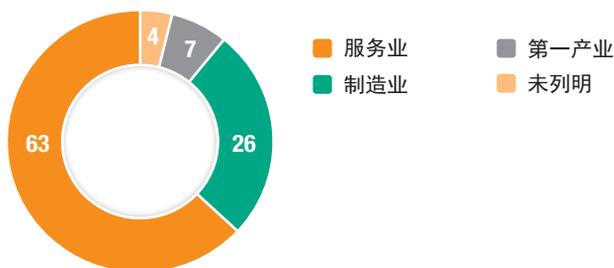
宣布的绿地投资依然疲软，下降到了6,960亿美元，下降2%，发达国家多国企业的绿地投资略有增加，而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多国企业的绿地的投资则有所减少。不管怎样，发展中国家在2014年宣布的跨境绿地投资总额中占30%。

### 向服务业投资的长期转变仍在继续

2012年是有数据可查的最近的一年，在这一年，服务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63%，几乎是制造业的占比(26%)的2.5倍，是第一产业的占比(7%)的9倍(图7)。这一比例是从2001年的58%涨上来的，持续了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向服务业较长期的相对转变。由于服务业占全球附加值的70%，因此原则上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额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图 7.

按部门分列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内流存量，  
2012年(占总值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外国直接投资/多国企业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除了世界经济结构的长期趋势以外，在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额和比例增加的背后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其中包括：东道国服务部门自由化程度提高；使服务更易于交易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兴起推动了制造业方面的服务国际化。

### 私募股权收购增加，但在全球并购中的比额下降

2014年，私募股权基金的跨境并购总额增加到2,000亿美元。这相当于全球并购总额的约17%，但从2013年的比例下降了6个百分点，比2008年的比额降低了13个百分点。私募股权投资价值的上涨趋势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因为有以下若干因素：投资者的现金和认购额特别高，估计约3,60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低利率使杠杆化债务更有吸引力；全球金融市场波动，预期会产生更多的跨境投资机会。北美洲和欧洲继续是私募股权基金进行跨境并购的主要目标区域；但亚洲在2014年占私募股权交易总额的份额达到了历史最高点。

### 主权财富基金的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它们管理下的资产的一小部分；国有多国企业的收购放慢

主权财富基金有100多家，它们管理着7万多亿美元的资产，约占管理下的世界总资产的十分之一，但外国直接投资只是这些资产中的小部分。2014年，主权财富基金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增加到160亿美元，结束了连续三年的下降。有些主权财富基金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包括跨境公司收购和海外房地产采购等从事长期投资。一半以上的主权财富基金已经开始或者扩大了对基础设施的外国

直接投资，这是它们一个重要的资产类别，因为该部门有很多大规模投资的机会，而且它的回报较稳定。

相反，国有多国企业的投资有所下降：2014年的跨境并购和绿地项目分别下降39%和18%，下降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国有多国企业的后退，部分原因是战略决定，如一些发达国家的公司决定合并它们在一些经济体的资产，同时在其他经济体予以出售。政策因素也影响到国有多国企业的国际化，例如采掘业对外国所有权的控制更加严格。

### 国际生产继续扩张：多国企业的外国销售和资产的增长比国内公司的要快

2014年，多国企业的外国子公司的国际生产有所扩张。销售额和附加值分别上涨7.6%和4.2%。外国子公司的就业人数达到7,500万人(表3)。外国子公司在东道经济体中的经济业绩有所改善，外国直接投资内流方面的回报率从2013年的6.1%提高到2014年的6.4%。但是，这种回报率仍然低于危机前(2005年至2007年)的平均回报率。

2014年底，约5,000家多国企业的现金持有量估计为4.4万亿美元，比2008年至2009年危机期间多40%。但是，有迹象显示，最大的100家多国企业和具体行业的公司(如公用事业)在开始减持它们的现金储备(图8)。在最近两年，一些行业的多国公司(如石油和气体以及公用事业等行业)已开始利用现金持有量来增加资本支出和收购。

表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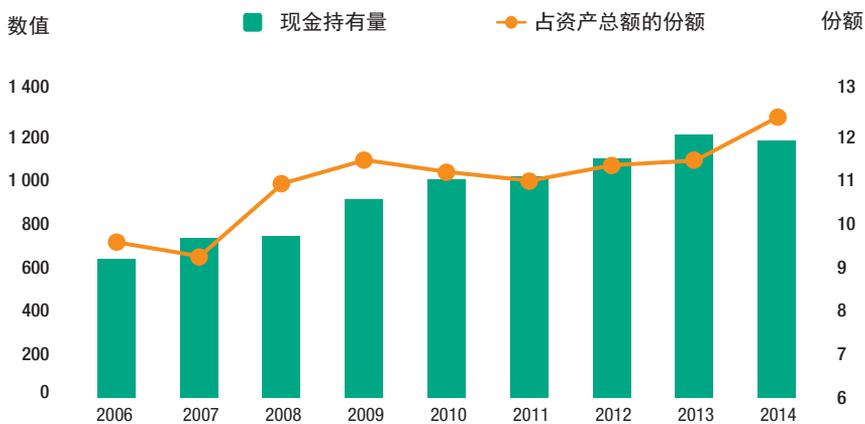
外国直接投资和国际生产的若干指标,  
2014 年和若干年份

项目	按现行价格计算的价值 (10亿美元)				
	1990	2005-2007 (危机前平均值)	2012	2013	2014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	205	1 397	1 403	1 467	1 228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	244	1 423	1 284	1 306	1 354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	2 198	13 894	22 073	26 035	26 039
外国直接投资流出存量	2 254	14 883	22 527	25 975	25 875
内流外国直接投资的收入 <sup>a</sup>	82	1 024	1 467	1 517	1 575
内流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 <sup>b</sup>	4.4	7.6	7.0	6.1	6.4
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收入 <sup>a</sup>	128	1 105	1 445	1 453	1 486
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回报率 <sup>b</sup>	5.9	7.6	6.6	5.8	5.9
跨境并购	98	729	328	313	399
外国子公司的出售	4 723	21 469	31 687	33 775 <sup>c</sup>	36 356 <sup>c</sup>
外国子公司的附加值(产值)	881	4 878	7 105	7 562 <sup>c</sup>	7 882 <sup>c</sup>
外国子公司资产总额	3 893	42 179	88 536	95 230 <sup>c</sup>	102 040 <sup>c</sup>
外国子公司的出口	1 444	4 976	7 469	7 688 <sup>d</sup>	7 803 <sup>d</sup>
外国子公司的就业(千人)	20 625	53 306	69 359	71 297 <sup>c</sup>	75 075 <sup>c</sup>
<b>备忘录</b>					
国内总产值 <sup>e</sup>	22 327	51 799	73 457	75 453	77 283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sup>e</sup>	5 592	12 219	17 650	18 279	18 784
特许权使用费和许可证费的收据	31	172	277	298	310
货物和服务出口 <sup>e</sup>	4 332	14 927	22 407	23 063	23 409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sup>a</sup> 根据2014年174个国家关于内流外国直接投资的收入和143个国家关于外流外国直接投资的收入的数据，两者都占全球内流和外流存量的90%以上。<sup>b</sup> 只为外国直接投资收入和存量数据都具备的国家计算。<sup>c</sup> 2013和2014年的估计数据所根据的是，各变量比照外流存量的固定效应面板回归以及1980-2012年期间的滞后因变量。<sup>d</sup> 对1998-2014年应用1998年外国子公司占世界出口的份额(33.3%)，以获取数值。1995-1997年的数据依据比照1982-1994年期间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外国子公司的出口线性回归。<sup>e</sup>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15年)。

图 8. 最大的100家多国企业的现金持有量及其在资产总额中的份额，2006-2014年  
(10亿美元,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根据Thomson ONE的数据。

## 外国直接投资的区域趋势

### 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保持稳定

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整体上稳定在540亿美元(表2)。**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减少到115亿美元，下降15%。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总体上的下降是因为有些国家的紧张局势和冲突，但另一些国家则有大量的流入。流入埃及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到48亿美元，上涨14%，流入摩洛哥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到36亿美元，上涨9%。

流向**西非**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到128亿美元，下降10%，这是因为埃博拉、安全问题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若干国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东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增加到68亿美元，上升11%。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气体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有所增加，埃塞俄比亚正在服装和纺织品领域成为多国企业的中心。**中部非洲**2014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达到121亿美元，比2013年增加33%。刚果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增加近一倍，达到55亿美元，因为尽管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外国投资者仍然没有受到阻吓。刚果民主共和国继续吸引了引人注目的流入。**南部非洲**2014年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为108亿美元，比2013年下降2.4%。南非仍然是该区域最大的东道国(57亿美元，比2013年下降31%)，但莫桑比克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了显著的作用(49亿美元)。

流入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越来越多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多国企业的兴起。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法国、美国和联合王国)在2014年从非洲的净撤资数额巨大。发展中经济体投资者对这些撤出的资产有很大的需求。因此，非洲的并购从2013年的38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51亿美元，上涨32%，特别是在石油和气体以及金融部门。

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中，服务业所占的部分最大，尽管比其他区域的份额要低，而且集中在较少量的国家，包括摩洛哥、尼日利亚和南非。金融业在非洲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所占的部分最大；到2012年，一半以上的非洲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是在金融业(56%)，其次相继是运输、储存和通讯(21%)以及商业活动(9%)。

### 发展中亚洲现在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区域

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上升到9%之后，**发展中亚洲**2014年达到了4,65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坐稳了该区域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接受区域的地位。

向**东亚**的流入量增加到了2,480亿美元，上升12%。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东道经济体，在这一数字中占一半以上。香港(中国)的流入量上涨39%，达到1,030亿美元。**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增加5%，达到1,330亿美元。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新加坡，它现在是世界第五大接受经济体，流入量达到680亿美元。东南亚其他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有强劲增长：向印度尼西亚的流入量增加20%，达到230亿美元。

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政策努力正在推进东亚和东南亚经济体之间的联系，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多国企业是该区域在这方面的主要投资者。香港(中国)、中国、日本和新加坡是该部门股权投资的几个最重要的区域来源。它们还通过非股权模式开展活动。区域基础设施投资受到关于加强联系的政策的支持，如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东盟成员国向外国开放运输业等等，因此肯定会进一步增长。流入**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2014年增加到410亿美元。印度占这一数字的四分之三，流入量增加22%，达340亿美元。该国在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方面也占主要地位，增加了五倍，达到100亿美元，从上一年急剧下降中恢复了过来。其他的一些南亚国

家，如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等，它们从中国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有所增加。在吸引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方面，特别是在资本密集型行业中，南亚落后于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体。但是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事例，如汽车业等等，印度汽车制造公司目前正在向印度以外扩张，将生产活动扩大到该区域的其他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和尼泊尔。

**西亚**的安全局势导致外国直接投资流量连续六年减少(2014年减少4%，为430亿美元)；该区域部分地区私人投资减弱由公共投资增加予以补偿。在海湾合作委员会经济体中，由国家牵头对建筑的投资着重于基础设施以及石油和气体开发，为外国承包商通过非股权模式在该区域从事新的项目开创了机会。从该区域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6%，为380亿美元，这是因为科威特和卡塔尔这两个该区域最大的投资国的流出量有所下降。从土耳其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翻了一番，达67亿美元。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经过四年的增长后开始下降

2014年，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不包括加勒比离岸金融中心)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14%，为1,590亿美元。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美洲的跨境并购减少78%，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使得对南部拉丁美洲采掘业的投资减少。向南部拉丁美洲的流动连续第二年减少，下降14%，为1,210亿美元，除智利以外，所有的主要接受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出现负增长。中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36%，为390亿美元，部分原因是墨西哥的一次跨境巨额交易造成2013年格外高的流量。

过去几十年，外国直接投资有两大潮流。第一个潮流始于1990年代中期，这是由于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鼓励了外国直接投资进入

服务业和采掘业等等部门，而这些部门以前对私人或/或外国资本是封闭的。第二大潮流始于2000年代中叶，原因是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引起对该区域(特别是南美洲)采掘业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由于南美洲的推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了十多年的强劲增长，但现在，该区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前景就不那么乐观了。该区域现在有机会对全区域两次外国直接投资潮的经验进行反思。决策者可以根据2015年后发展议程就外国直接投资对该区域发展道路的作用问题考虑各种潜在的政策选择。

### 2014年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减少一半以上

2014年，流入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52%，为480亿美元，这是2005年以来前所未见的。在**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区域冲突，再加上油价下跌和国际制裁，削弱了外国投资者对当地经济体的实力的信心。俄罗斯联邦是该区域最大的东道国，但由于国内的负增长前景，以及因俄罗斯联邦石油公司Rosneft与英国石油公司BP的一笔巨额交易而改变了2013年达到的流量，因此它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下降了70%。在**东南欧**，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稳定在47亿美元。外国投资者的目标大都对准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具有竞争力，而且进入欧盟市场较容易。

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多国企业，主要是俄罗斯联邦的多国企业，特别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的限制和大宗商品价格低廉而减少了它们在海外的投资，因此转型期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31%，为630亿美元。

在俄罗斯联邦，制裁以及经济疲软和其他因素等开始在2014年下半年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这种趋势预期在2015年和2015年以后将继续下去。寻求市场的外国投资者，例如在汽车和消费行

业，正在逐渐减少在该国的产量。大众汽车公司(德国)将减少它在卡露加的产量；百事公司(美国)已宣布一些工厂将停产。在俄罗斯联邦国内，投资者的来源地分布正在发生变化。来自发达国家多国企业的新投资在放慢，但这种损失有一部分正在由其他国家来填补。2014年，中国成为俄罗斯联邦的第五大投资国。

### 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减少

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连续第三年倒退，下降28%，为4,990亿美元，是2004年以来的最低点。流入欧洲的外国直接投资继续着自2012年以来的下降趋势，为289亿美元。流入南美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一半，为1,460亿美元，主要是由于沃达丰公司对Verizon公司1,300亿美元的撤资交易，否则，流量应该是稳定的。

2014年收益最大的欧洲国家是2013年出现负流入量的那些国家，如芬兰和瑞士等等。对联合王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飙升至720亿美元，在欧洲占据最大接受国的地位。与此正相反，2013年外国直接投资量大的接受国，它们的内流量急剧下降，如比利时、法国和爱尔兰等国。流入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都有所收缩。

从发达国家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稳定地保持在8,230亿美元。从欧洲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大致不变，保持在3,160亿美元。从德国流出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增加了两倍，成为欧洲最大的直接投资国。法国的外流量也大幅度增加，与此相反，来自其他主要投资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减少。在北美洲，加拿大和美国的外流量都只略有增加。日本的外流量减少16%，结束了连续三年的扩张。

多国企业的业务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有所加大，这不仅是由于外国直接投资，而且还由于公司内部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收入。

美国和日本最近的经验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外流所带来的投资收入日益增加，对贸易赤字是一种平衡。此外，对外投资帮助开创了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出口渠道。

### 流向结构薄弱、脆弱和小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趋势

流向**最不发达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4%，达230亿美元，主要是由于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缅甸和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增加。宣布的对这一组国家的绿地投资量达到六年来的新高，领头的是安哥拉的一项160亿美元的石油和气体项目。与此相反，莫桑比克的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大幅度减少，其他接受国，包括孟加拉国、柬埔寨、刚果民主共和国以及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等也出现了外国直接投资增长薄弱或者负增长的情况。

流向**内陆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少3%，为290亿美元。在这一组国家中，亚洲国家的减少量最大，主要是因在蒙古的投资下跌，它的内流量连续第三年减少。在中亚的内陆发展中国家，来自发展中和转型期经济体的投资者在外国直接投资存量方面越来越重要，这些经济体主要以中国、俄罗斯联邦、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韩民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等国为首。外国直接投资仍然是内陆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它在全球金融危机后超过了官方发展援助。

流入**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22%，2014年达70亿美元，主要是由于跨境并购销售的增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巴哈马、牙买加和毛里求斯是流向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的**最大目的地**，占总量的72%以上。向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流量因石

化业的一次12亿美元的收购而大幅度增加；跨境收购也推动了毛里求斯外国直接投资流量的增加。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石油和气体业也发生了一些跨境巨额交易。与此相反，向牙买加(该组国家的第二大接受国)的流量减少了7%，为5.51亿美元。

对2002年蒙特雷第一次发展筹资会议以来流入结构薄弱、脆弱和小型经济体的外部资金进行了一次考察，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在推行可持续发展以及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方面具有潜力。与其他融资来源相比，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大，稳定，对发展的影响多种多样，因此它一直是外部发展融资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鉴于外国直接投资对生产和出口能力的贡献，因此它对这些经济体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包括与其他融资来源一起发挥作用。包括公私、国内外所有资金来源在内的一种整体方法，对有效地为所有这三类经济体筹集发展资金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一个要在2015年7月亚的斯亚贝巴第三次发展融资会议以及随后的会议上讨论的一个视角。

在过去十年(2004-2014年)，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翻了三番，内陆发展中国家翻了四番。如果国际投资—发展界能共同努力，就能够在2030年前使这些结构薄弱的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翻四番。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努力，利用融资促进经济多样化，以加强这些国家的抵御力和可持续性。

## 投资政策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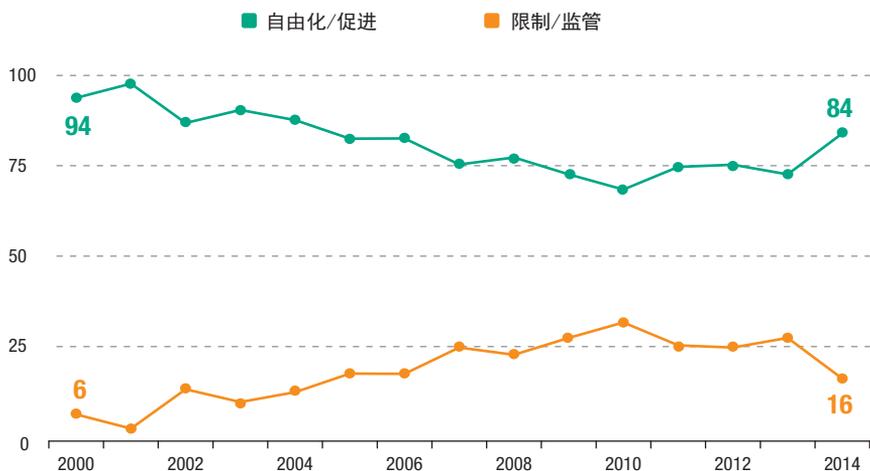
### 国家的投资政策措施仍然以投资的自由化、促进和便利化为主导

贸发会议的数据表明，2014年，37个国家和经济体采取了至少63项影响外国投资的政策措施。在这些措施中，有47项涉及投资的自由化、促进和便利化，有9项实行对投资的新的限制或监管(其余7项措施为中性)。自由化和促进的份额显著增加，从2013年的73%增加到2014年的84%(图9)。

一些国家实行或修正了它们的投资法律或准则，以给予新的投资奖励或者使投资程序便利化。若干国家放松了对外国所有制的限

图 9.

国家投资政策的变化，2000年至2014年  
(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投资政策监测。

制，或者向外国投资开放新的商业活动(如在基础设施和服务行业)。新实行的投资限制或监管主要涉及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以及战略部门(如运输、能源和国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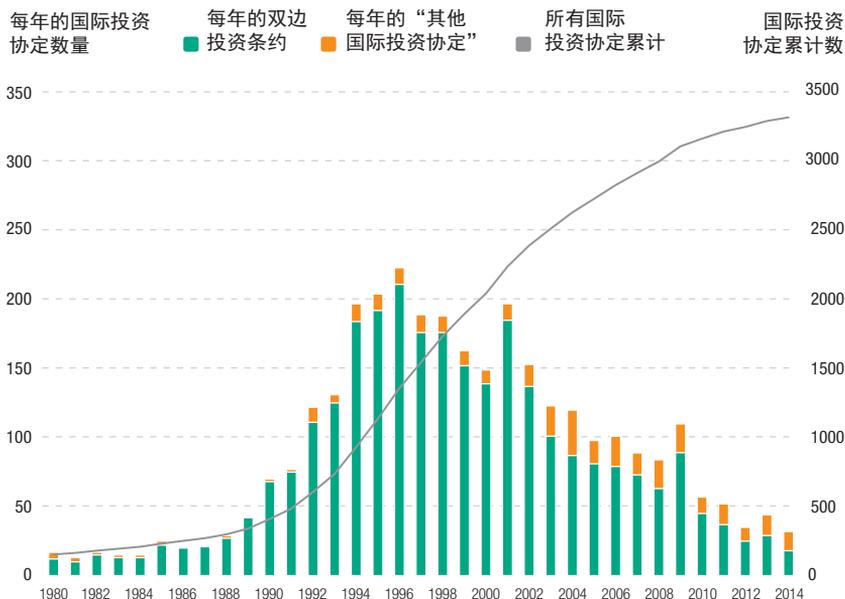
### 在对可持续发展重要的部门进行投资方面，有针对性的措施仍然较少

在2010年至2014年据报告的所有投资政策措施中，涉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的份额较少(约8%)。大多数措施专门针对加强私营部门对关键的可持续发展部门的参与(基础设施、保健、教育、气候变化减缓)。各国应加强投资便利化努力，将更多的投资引导到对可持续发展特别重要的部门。同时，它们必须建立一个健全的监管框架，以争取使投资对发展的积极影响最大化，并在这些对政策敏感的部门保护公共利益，以使所涉的风险最小化。

### 随着区域层面的加紧努力，国际投资协定的领域在继续扩大

由于增加了31项国际投资协定，因此到2014年底，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已增加到3,271项条约(2,926项双边投资条约，345项“其他国际投资协定”)(图10)。2014年缔结国际投资协定最积极的国家是加拿大(7项)、哥伦比亚、科特迪瓦和欧洲联盟(欧盟)(各为3项)。总的来看，虽然双边投资条约的数量每年在减少，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区域和次区域层面开展国际投资协定的谈判。例如，当前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三方和关于加强经济关系的太平洋补充协定的谈判等五项努力中有近90个国家的参与。

图10. 签署国际投资协定的趋势，1980-2014年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国际投资协定数据库。

2014年还缔结了84项避免双重征税条约。这些条约适用于东道国与母国之间跨境投资业务的财政待遇。避免双重征税条约和双边投资条约网络同时扩大，全世界现在有3,000多项避免双重征税条约在生效。双边投资条约和避免双重征税条约网络有大量的重叠；双边投资条约关系中有三分之二也是避免双重征税条约所涉及到的。

### 国家和区域在探讨国际投资协定改革

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区域在按照国际投资法最近的发展情况审查它们的国际投资协定版本。这种趋势不只局限于某一国家群体或者

区域，而且还涉及到了非洲(有12个国家在审查自己的版本)、欧洲和北美洲(10个国家)、拉丁美洲(8个国家)、亚洲(7个国家)等地区的国家，还涉及到6个转型期经济体以及至少4个区域组织。南非和印度尼西亚在继续终止它们的条约，同时在制定新的国际投资协定战略。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2015年2月举行的国际投资协定制度转型问题贸发会议专家会议上表明了自己采取的新办法。随后，欧盟和挪威也于2015年5月表明了这种办法，欧盟编制了一份概念文件，挪威制定了一项新的双边投资条约版本。这些新办法的目的都是在使国际投资协定现代化，并进一步改善它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内容。贸发会议的投资政策框架是新一代的投资政策，在上述进程中被广泛地用作主要的参考。

### 新的国际投资协定考虑为公共利益保障监管权的因素

在受审查的协定中大多至少包括一项贸发会议投资政策框架所载的关于为公共利益(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保障监管权的规定。这包括一般性例外，对关键保护标准的澄清，明确承认各方不应为了吸引投资而放松卫生、安全或环境标准的条款，对条约范围的限制以及更详细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规定。

### 有设立前承诺的国际投资协定在增加

虽然数量较小(228项)，但载有“设立前”承诺的国际投资协定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义务适用于“投资的设立、收购和扩张”，这种协定的数量在增加。大多数涉及一个发达经济体：美国、加拿大、芬兰、日本和欧盟。同样，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少数发展中国家也在缔结设立前国际投资协定，其中包括智利、哥斯达黎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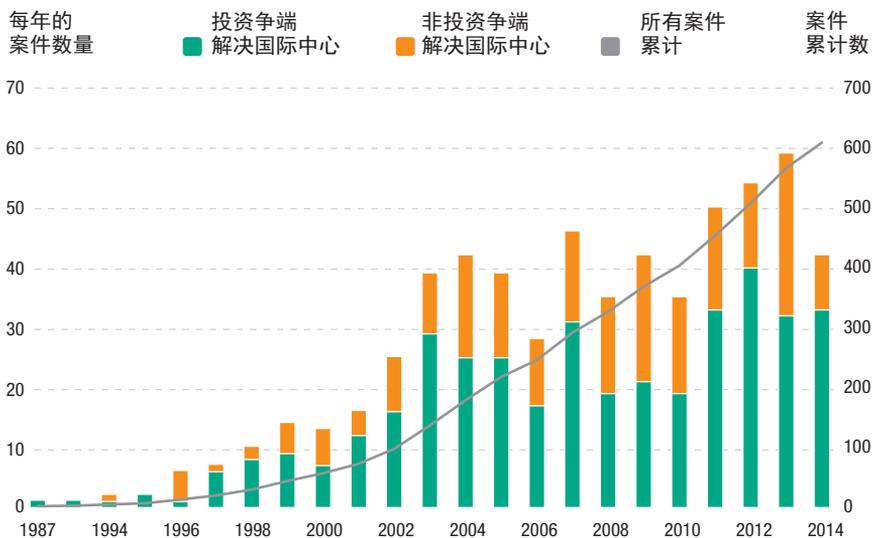
韩国、秘鲁和新加坡。在将设立前承诺纳入国际投资协定时，如要保障监管权，就要采用保留和安全阀。

### 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新案件有所减少，对发达国家的诉讼案比例仍然很高

2014年，投资者根据国际投资协定发起了42项已知的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诉讼。去年的发展情况使已知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诉讼总数达到608起(图11)，对全世界99个国家的政府提起诉讼。新的诉讼中约有40%是向发达国家提起的。2014年，结案数量达405起。国家胜诉的案件占36%(144起)，投资者胜诉27%(111起)。其余案件有的获得解决，有的终止。

图11.

### 已知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案件的每年和累计数量，1987-2014年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数据库。

## 改革国际投资制度：一份行动菜单

### 国际投资协定制度正处于十字路口；迫切需要进行改革

对全球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当前的运作情况的不安越来越严重，再加上今天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扩大，以及投资格局的演变等，都触发了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进行改革的举动，以使之更好地适合于今天的政策挑战。因此，国际投资协定制度正在经历一个反思、审查和修订的时期。

2014年10月贸发会议世界投资论坛、许多国家激烈的公共辩论、以及各种各样的议会听证活动(包括在区域一级的活动)，都证明正在出现一种共识，要对国际投资协定制度进行改革，使之适用于所有利益相关方。问题并不在于是否要改革，而在于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以及改革的范围。

### 本世界投资报告为这种改革提供一份行动菜单

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响应上述关于改革的呼吁，提供一份行动菜单。它根据获得的教益，确定改革的各种挑战，分析各种政策选择，为各层面的决策提供行动方面的指南和建议。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可利用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制定方面六十年的经验。关键的教益有：(一) 国际投资协定会适得其反，可能会有预见不到的风险，因此需要制定保障措施；(二) 国际投资协定作为一种投资促进和便利化的工具，有其局限性，但还有未经充分利用的潜力；(三) 国际投资协定对政策和系统一致性以及能力建设有更广泛的影响。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应处理五大挑战：

- 为推行可持续发展目标保障监管权。国际投资协定能限制缔约方在国内决策方面的主权。因此，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必须确保这种限制不过度制约合法的公共决策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目标。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各种方案中包括进一步完善和界定国际投资协定的保护标准(如公平和平等待遇、间接征收、最惠国待遇等)以及加强“安全阀”(如公共政策例外、国家安全、国际收支平衡危机)。
- 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今天的投资者与国家仲裁制度发生了合法性危机。各种改革方案中包括改善投资仲裁的现行制度(进一步完善投资程序，限定诉诸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的范围)，对现行制度增加新的内容(如一项上诉措施、争端预防机制)或者予以替代(如用常设国际法院、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和/或)国内司法程序)。
- 投资促进和便利化。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缺乏有效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规定，它们只是通过其中提供的保护措施来促进投资。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各种方案中包括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关于投资促进和便利化的内容以及国内政策工具，将促进措施对准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方案涉及母国和东道国措施，这些措施之间的合作以及区域倡议。
- 确保负责任的投资。外国投资能对东道国的发展作出一系列的积极贡献，但它也可能会对环境、卫生、劳工权利、人权和其他公共利益产生消极影响。通常，国际投资协定没有规定投资者有责任对它们受到的保护作出回报。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各

种方案包括：增加防止降低环境或社会标准的条款、规定投资者必须遵守国内法律的条款以及加强公司社会责任的条款。

- 加强系统一致性。在缺乏多边投资规则的情况下，由于国际投资条约制度的分散、多方面和多层次，在国际投资条约之间、国际投资条约与其他国际法文书之间以及在国际投资条约与国内政策之间产生了缺口、重叠和不一致。国际投资条约改革的总方案，目的是更好地管理国际投资条约与其他法律体系之间的互动以及国际投资条约制度内部的互动，以便予以整合并合理化。这些方案的目的还有，将国际投资协定改革与国内政策议程及其落实结合起来。

本报告提出一些应对上述挑战的政策选择。这些政策选择涉及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不同方面(国际投资协定的实质性条款、投资争端解决)和面向改革的决策的不同层面(国家、双边、区域和多边)。总的来说，关于改革的这些政策选择处理国际投资协定所涉及的标准内容，并与国际投资协定中找到的典型条款相匹配。

在对国际投资协定改革采取任何行动前要作出一些战略选择。这包括：是否要缔结新的国际投资协定？是否要脱离现行国际投资协定？或者是否开展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在确定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性质，尤其是改革的实质内容和改革进程方面也需要作战略选择。在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实质内容方面有以下若干问题：改革议程的广度和深度，投资保护和保障监管权的必要性之间的平衡，对母国和东道国战略意义的考虑，以及如何使国际投资协定改革与国内投资政策调整同步？在改革进程方面有以下一些问题：是整合国际投资协定网络还是继续它的碎片化？在哪些领域确定各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优先事项？

在实行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和选择涉及条约内容的最佳方案时，决策者必须考虑这些方案的综合影响。改革方案的一些组合会“过头”，造成条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在投资保护方面的基本存在理由。对于每一项改革行动及其组合，决策者必须尽可能确定最佳方法，以保障监管权，同时提供投资保护和便利化。

### 改革需要有一种全球性的方法，以便使国家、双边和区域层面的行动实现同步

就进程而言，必须在国家、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开展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行动。每一个层面的改革进程都包括：(1) 检查并确定各种问题，(2) 拟订一项战略方法和一项改革的行动计划，(3) 采取行动并取得成果。

国家层面(如新的国际投资协定版本)或双边层面(如重新谈判“旧的”国际投资协定)采取的改革步骤能够在各国的改革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步骤可能会延续(如果不是恶化)全球国际投资协定制度的碎片化和不一致。多边或区域层面的改革倡议，虽然挑战较大，费时较长，但能够找到共同的解决办法，形成广泛的共识，因此是一条整合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途径。区域改革进程的范围可以从集体审查基本的区域(和双边)条约网络到实行该网络的整合。在多边层面，对系统风险和正在出现的问题进行全球审查和确定，可能会因此而对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关键问题形成共识，最终能促进更加协调的方法，包括在今后制定国际投资规则方面。这种努力将有利于整合并简化国际投资协定网络，使之适用于可持续发展。

本报告为改革进程提出改革方法、准则、工具、解决办法和路线图，它为国际投资协定改革提供了一份行动菜单。它汇总了贸发会议和其他机构最近几年就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方方面面所作的各种贡献。它请各国利用这一行动菜单，并界定它们自己的国际投资协定改革路线图：各国可以根据各自的改革目标，挑选各自的改革行动和方案，以组成它们自己的改革一揽子方案。

**表 4.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准则**

**说明**

<b>1. 利用国际投资协定促进可持续发展</b>	国际投资协定改革的最终目标是确保国际投资协定制度更好地适应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同时保护和促进投资。
<b>2. 聚焦关键的改革领域</b>	关键的改革领域是：(一) 为公共利益保障监管权，(二) 改革投资争端解决机制，(三) 加强国际投资协定的投资促进和便利化职能，(四) 确保投资者的责任，(五) 加强系统一致性。
<b>3. 在各层面采取行动</b>	改革进程应采取多层面的方法，并在国家、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上开展，同时在各层面采取适当和相互支持的行动。
<b>4. 为具体的解决办法适当安排次序</b>	各层面的改革进程应采取一种渐进和逐步的方法，并以查明事实和问题，拟定战略计划，争取取得体现改革努力的具体成果等为标准来适当安排行动的次序和时间。
<b>5. 确保包容性和透明的改革进程</b>	改革进程应该是透明和具有包容性的，能够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发表意见，并作出贡献。
<b>6. 加强多边支助结构</b>	改革进程应该受到普遍和包容性的结构支持，以便提供支助，包括通过政策分析、技术合作以及经验交流和能力建设的平台等，从而帮助在各层面协调改革行动。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所有这一切应该以以下目标为指导：利用国际投资协定促进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确定最有效的保障监管权的手段，同时提供投资保护和便利化。改革应聚焦于关键领域，纳入各层面的行动，采取系统和有顺序的方法，确保包容性和透明，并利用多边支助结构(表4)。

在缺乏多边制度的情况下，并鉴于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数量巨大，因此，要使国际投资协定制度适用于可持续发展，最佳方法是用一个全球性的支助结构来对它进行集体改革。这种全球性的支助结构能通过政策分析、协调、管理与其他法律体系的互动、技术援助和建立共识来为国际投资协定改革提供必要的支助。只有采取一种共同的方法，才能产生这样一种国际投资协定制度，即它的稳定性、明确性和可预见性有助于实现所有利益相关方的目标：有效利用国际投资关系推行可持续发展。

## 国际税务和投资政策的一致性

目前，国际社会正在就多国企业的财政贡献问题开展激烈的辩论和具体的政策工作。焦点主要是在避税问题上，尤其是在20国集团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项目中。同时，特别是鉴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需求，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需要有持续的投资。政策方面的当务之急是对避税行为采取行动，以支持国内筹集资源，并继续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性投资提供便利。

### 外国子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的贡献约占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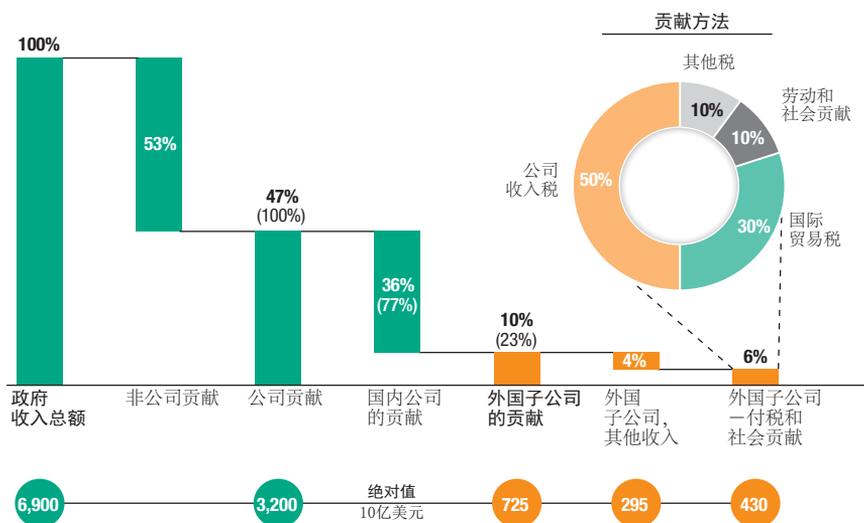
在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过程方面从事工作的决策者和专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对政府收入至关重要的这项数值作出总的量化。各种研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就多国企业避免缴纳的税额提出各种估算。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成一致的估算，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界定多国企业实际财政贡献的基线。

贸发会议将多国企业的外国子公司对发展中国家政府预算的贡献估计为约每年7,300亿美元(图12)。这代表了平均占公司贡献总额的约23%，占政府总收入的10%。这种贡献的相对数量(和组成)各国和各区域有差别。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高，说明发展中国家对公司贡献的开放度和依赖度(平均而言，非洲国家的政府的预算资金有14%依赖外国公司的付款。)

此外，国家在发展阶梯上的层级越低，就越依赖公司提供的非税务收入流。在发展中国家，外国子公司通过对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图12.

多国企业外国子公司对  
政府收入所作的贡献  
占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的份额，  
2012年作为参考年（百分比，10亿美元）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使用费、关税、工资税和社会贡献以及其他类型的税收和征费而对政府收入作出的贡献要比通过公司收入税作出的贡献多一倍以上。

### 全球跨境投资有约30%经过离岸中心

尽管多国企业发挥了向政府收入作贡献的总体作用，但它们像所有其他公司一样，其目的是尽量少缴税。多国企业通过跨境投资建立公司结构。在这过程中，它们采取尽量省税的方式，并以自

己的商业和业务需求为限。因此，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规模和方向常常受到多国企业税务考虑的影响，因为初始投资的结构和方式有助于在随后的投资收入方面创造避税的机会。决策者在处理避税问题，尤其是在处理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办法中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着重于税务规则和透明度原则，即对收入的会计核算。跨境投资的基本作用是帮助避税，但这也应该从互补的视角予以考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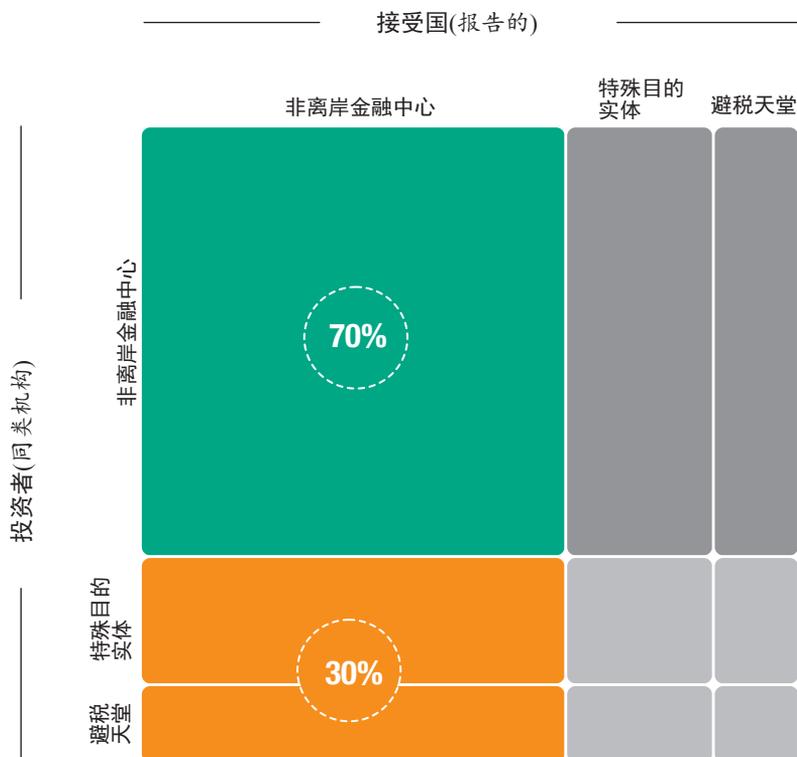
对避税问题的投资视角聚焦于离岸投资中心(其他国家的避税天堂和特殊目的实体)作为全球投资主要参与者的作用。贸发会议的《离岸投资矩阵》列示离岸投资中心对国际投资结构的无处不在的作用(图13)。2012年，非离岸接受国的国际公司投资存量估计达21万亿美元(图中的有色区域)，其中有30%以上，即约6.5万亿美元通过离岸中心(橙色区域)输送。最大的离岸投资参与者是向所谓的特殊目的实体提供便利的辖区。

从该矩阵的镜像视图可见，在来自非离岸投资国的跨境公司投资总存量中，有28%投资于基于离岸中心的中间实体(深灰色区域)。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实体可能会在更高一级的税务辖区代表有关的公司从事一些经济活动，如管理事务、财产行政管理或金融事务等等。它们常常相当于“信箱”公司，即为税务最优化而设置的合法机构。这些实体在为多国企业的业务融资中发挥重要的过境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全球公司投资数字的双重核算。在贸发会议的外国直接投资统计中，这种双重核算效应通过从报告的外国直接投资数据中减去专门目的实体部分来予以消除。

多国企业利用了辖区之间的税率差、立法错配和税务条约所造成的一系列避税杠杆。多国企业的税务策划涉及复杂的多层面公司

图 13.

按投资者类型分类的非离岸金融中心内投资存量  
离岸投资矩阵的纵向视图 (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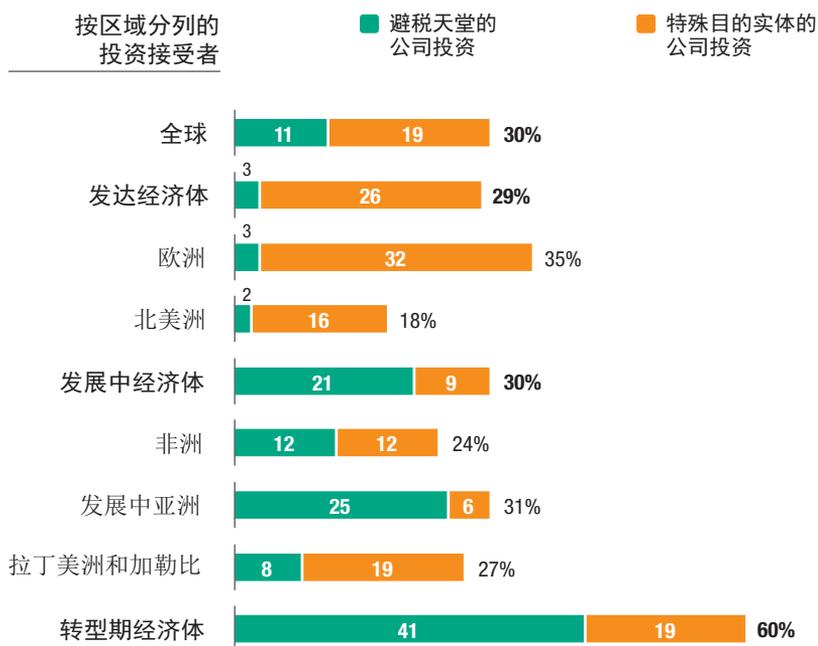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结构。最典型的主要有两类 (一) 基于无形资产的转移定价计划和 (二) 融资计划。这两个计划代表了避税做法的有关部分，它们利用与离岸投资中心的实体有关的投资结构，这些融资计划特别依赖通过离岸中心的直接投资联系。

## 发展中国家因通过离岸投资中心的避税行为而损失的收入约达1,000亿美元

多国企业的避税做法是事关所有国家的全球性问题：对来自离岸中心的投资的开放性，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大致类似(图14)。但是，利润转移出发展中国家，这可能对它们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源限制或缺乏技术专门知识，因此在处理高度复杂的避税做法方面常常能力较低。

图14. 按区域列示的对来自离岸投资中心的投资的开放度，2012年  
离岸中心的公司投资存量份额(百分比)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避税做法造成发展融资资源的严重流失。发展中国家每年损失的税收中估计有1,000亿美元是由于直接与离岸中心相联的内向投资存量。东道国的内流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申报的(应交税的)外国直接投资回报率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经过离岸中心的投资越多，应交税的利润则越少。平均而言，在全部发展中经济体，离岸投资每增加10个百分点，回报率就会降低1个百分点。(平均效应掩盖了具体国家的影响。)

这些结果不一定能扣住多国企业避税的全部范围，它们只反映了通过离岸中心利用直接投资联系的计划。贸发会议编制的“离岸指标”把对总体上政府收入的损失估计放在一边，而向决策者提供一种本身所固有的价值，作为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单一指标”，并作为关于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在国家层面的影响的一种经验法则。

多国企业和国际投资者的避税做法造成发展中国家政府收入的大量损失。这种情况对辖区之间税务收入分配所意含的公平性这一基本问题必须予以解决。处于特别不利地位的是那些征税能力有限，较多依赖从公司投资者的税务收入和日益面临离岸投资的那些国家。

因此必须采取行动，处理避税问题，同时认真考虑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 国家和国际税务和投资政策应该协同地发挥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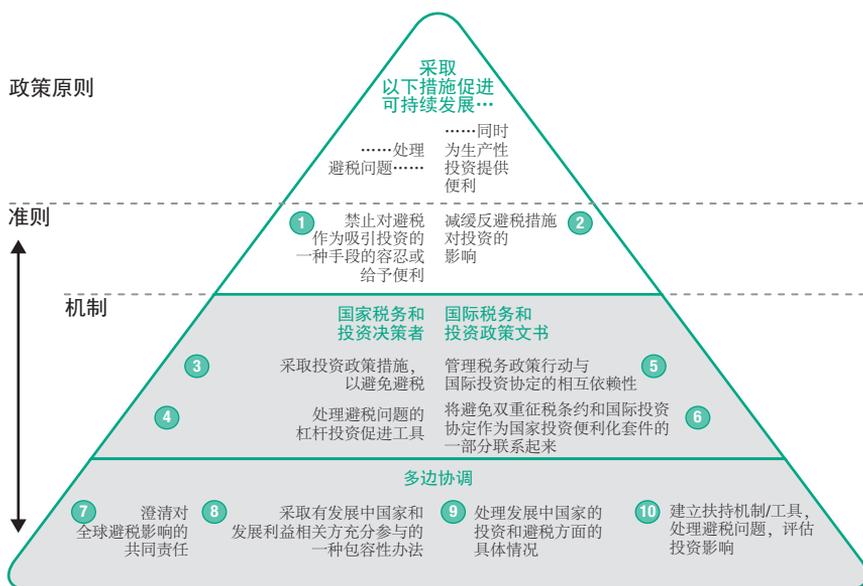
当前，离岸投资中心在国际投资流动中发挥系统作用：它们是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融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国际层面的任何措施，

反而可能影响这些中心的投资便利化作用的，或者可能影响到关键的投资便利化杠杆(如税务条约)的，都必须纳入一种投资政策的视角。

国际社会目前的反避税讨论很少注意投资政策。

跨境投资对建立能够避税的公司结构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投资政策应该构成任何解决办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图15. 关于协调的国际税务和投资政策的准则



资料来源：贸发会议。

关于协调的国际税务和投资政策的一套准则可能有助于在投资政策和反避税倡议之间实现协同(图15)。本报告提出讨论的10条准则，其关键目标包括：消除作为投资促进杠杆的冒进式税务策划机会；考虑反避税措施对投资的潜在影响；在承认投资东道国、母国和过境国之间的共同责任方面采取一种伙伴关系的方法；管理国际投资和税务协定之间的互动；加强投资和财政收入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并提高发展中国家处理避税问题的能力。

## 结 语

2014年《世界投资报告》表明，全世界对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巨大，外国直接投资必须对填补投资缺口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改善全球投资政策环境，包括加强国际投资协定和国际税务制度，都必须是优先要做的事情。这两个制度相互关联。它们的最终目标一致：促进跨境投资并给予便利。它们的结构类似：都是由3,000多项双边协定组成的一个“意大利面碗”。这两个制度面临的挑战类似。它们相互影响。它们都在实行改革。

两个制度各有自己具体的改革优先事项，但还是应该考虑一个共同的议程。这种议程的目标可以是：扩大包容，改善治理，加强协调，以管理国际税务和投资政策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避免这两个制度之间的冲突，而且还要使它们相互支持。

要建立并维持一个投资的扶持性环境，使达到发展融资指标的机会最大化(将在2015年7月中旬亚的斯亚贝巴的第三次发展融资问题国际会议上讨论)，并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其根本就是要改革国际投资治理。国际投资和发展界应该而且能够最终为所有人的利益建立一个全球投资合作的共同框架。



## 世界投资报告历年期刊

- WIR 2014: Investing in the SDGs: An Action Plan***
- WIR 2013: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 WIR 2012: Towards a New Generation of Investment Policies***
- WIR 2011: Non-Equity Modes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 WIR 2010: Investing in a Low-carbon Economy***
- WIR 2009: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 WIR 2008: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
- WIR 200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Development***
- WIR 2006: FDI from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Economies: Impl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 WIR 2005: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D***
- WIR 2004: The Shift Towards Services***
- WIR 2003: FDI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 WIR 200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Export Competitiveness***
- WIR 2001: Promoting Linkages***
- WIR 2000: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Development***
- WIR 1999: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Development***
- WIR 1998: Trends and Determinants***
- WIR 1997: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Market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Policy***
- WIR 1996: Investment,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Arrangements***
- WIR 1995: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Competitiveness***
- WIR 1994: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Employment and the Workplace***
- WIR 1993: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 WIR 1992: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s Engines of Growth***
- WIR 1991: The Triad i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 SELECTED UNCTAD PUBLICATION SERIES ON TNCs AND FDI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www.unctad.org/wir](http://www.unctad.org/wir)

FDI Statistics  
[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http://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Global Investment Trends Monitor  
[www.unctad.org/diae](http://www.unctad.org/diae)

Investment Policy Hub  
<http://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

Investment Policy Monitor  
[www.unctad.org/ia](http://www.unctad.org/ia)

Issu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I and II (Sequels)  
[www.unctad.org/ia](http://www.unctad.org/ia)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ies for Development  
[www.unctad.org/ia](http://www.unctad.org/ia)

Investment Advisory Series A and B  
[www.unctad.org/diae](http://www.unctad.org/diae)

Investment Policy Reviews  
[www.unctad.org/ipr](http://www.unctad.org/ipr)

Current Series on FDI and Development  
[www.unctad.org/diae](http://www.unctad.org/dia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Journal  
[www.unctad.org/tnc](http://www.unctad.org/tnc)

## HOW TO OBTAIN THE PUBLICATIONS

The sales publications may be purchased from distributors of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y may also be obtained by contacting: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Customer Service  
c/o National Book Network  
15200 NBN Way  
PO Box 190  
Blue Ridge Summit, PA 17214  
email: [unpublications@nbnbooks.com](mailto:unpublications@nbnbooks.com)

<https://unp.un.org/>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the work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please address inquiries to:

Division on Investment and Enterpris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Palais des Nations, Room E-10052  
CH-1211 Geneva 10 Switzerland

Telephone: +41 22 917 4533  
Fax: +41 22 917 0498  
[www.unctad.org/diae](http://www.unctad.org/diae)